

# 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统

曹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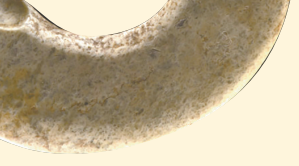
小南山遗址第一期遗存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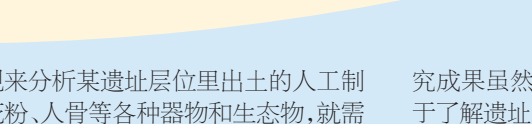
2017年墓葬出土的玉环



玉环上的砂绳切割痕迹



玉珠



# “两张皮”的困境

陈淳

现在我国考古学面临着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成果难以契合的“两张皮”困境。近几十年来,科技考古迅速发展,不但专业人员迅速增加,而且社科院考古所和各省的考古所及高校都大力建设科技考古实验室,并有大量成果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然而,虽然科技考古取得蓬勃发展,但是除了给考古发现带来不少惊喜和为考古报告增添一些科学主义的表现外,似乎对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以及以历史重建为目的的战略性探索并没有带来本质的改观。这需要我们克服学科间的隔阂,加强多学科的合作,否则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有句古语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用“皮”和“毛”的关系来形容也许更加形象。所谓的“皮”就是考古学的范式,而“毛”就是科技考古的方法。换言之,当下我国考古学方法超前,而范式滞后的现状,是导致科技手段在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问题上并无用武之地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的范式是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构建区域文化年表和文化关系,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进行相对断代的方法。1950年代末,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一方面将考古工作者从繁琐而费力的断代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速率。而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断代工作,世界各地的田野工作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区域文化年代框架。这样,从1960年代起,首先在美国,继而在英国开始了考古学范式从文化-历史学向过程考古学范式的转变。这就是新考古学倡导的探索人地关系、文化适应和社会变迁。

这个转变最初以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在西亚新月沃地和理查德·麦克尼什在中美洲特坎坎农业起源探索为前驱,两者都是采用多学科方法,从环境变迁来探索西亚和中美洲的农业起源。这两位考古学家邀请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包括地质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土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等参与这个项目的各个专题分析,以重建两地自全新世以来气候环境、人类生活和适应,以及技术和聚落形态的变化。布雷德伍德和麦克尼什的农业起源项目,开创了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和科技考古的先河。

1960年代新考古学是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



小南山遗址第二墓地的墓坑和环沟(2019年)



小南山遗址第二墓地的封石堆

达此地并有所交流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致同一时期,东北亚的某些人群携带着与东北亚广泛流行,在小南山也有发现类似的柳叶状尖状器等工具组合,利用末次冰期的某个气候波动间隙,追着大型猎物,跨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节点就位于小南山一期的范畴之内,但是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并没有掌握制陶技术,他们后来经摸索重新发明了陶器,说明他们可能与小南山遗址所代表的人群并无直接关系。东北亚年代较早的陶器与华南地区傍水适应的丰富采集者更早期发明的陶器有无传播关系,因为缺环太多,且早期陶器可能的分布区域沿海大陆架在全新高世高温期被上升海平面淹没等原因而难以确认,但是年代学与类型学研究以及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在基因上与东南亚现代人的亲缘关系等,均强烈暗示着东亚地区早期陶器一源性与传播的可能性,在黑龙江与环日本海一代形成长期持续的傍水丰富采集(渔)文化,和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中心。最早具有美石装饰功能的玉石制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北方现代人从阿尔泰经过贝加尔湖地区带到东北亚,并被小南山和兴隆洼人进行升华改造,为中华玉文化奠定了源远流长的万年基础。

郭大顺先生曾提出玉文化渔猎文化起源假说。他认为,玉器相关的材质、工艺、技术、观念等既和近水生活有关,也与长期狩猎培养出来的特别的生命意识有关。这正是黑龙江与环日本海一带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特质。系统梳理过玉石装饰品从阿尔泰经过贝加尔湖向东北亚传播并发展为东北亚环日本海最早玉文化圈的邓聪先生,也认为玉石材料早期作为装饰品和通灵用品的特性,浓缩了早期人类的生命崇拜世界观。傍水的丰富采集经济可能是驯化动植物的农牧业产生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在农业之前已经可以形成资源丰沛和相对安居的生活方式,而远道而来的文化间交往碰撞,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因此,陶器以及玉石装饰品发展出独特的玉文化孕育于东亚大陆东段的傍水丰富采集经济看来并非偶然。迁徙到新大陆,长期盘踞在北美西北段的印第安人丰富采集者此后甚至孕育了达到酋邦阶段的复杂社会,也证明了这种经济形态对于复杂社会的支撑能力。

小南山第二期遗存距今9000年前后,时间上比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还要稍早,但遗址中已经形成明确的墓地分区,并有不同的积石埋葬形式,表明当时这里的渔猎采集社会已经相当发达,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活动地域和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落后于中原等早期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现在我们说中华文化的万年起步,不仅指浙江上山文化的万年稻作村居和湖北峡上一带的早作原始农业村落,小南山遗址所代表的早期玉文化及其背后的丰富采集社会无疑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它们都熔铸进了此后华夏的文化与文明基因之中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柴尔德将全新世之交,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人类文化变化总结为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新石器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以磨光石器取代了打制石器,还包括农业和陶器等重大发明和普遍使用,而在中,还应该加上作为石器文化最高表现的玉文化的初步形成。这些破天荒的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推广,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时代,开启一种新生活,并根据各地不同环境与适应模式,开启向复杂社会和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

然而,从新石器革命经过农耕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的道路却同样因各地不同环境和特性而有不同发展模式。最著名的西亚新月沃地是麦类农业的发源地,在向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尼罗河谷以及印度河谷的扩散过程中,分别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三大古文明。这一驯化中心的年代最早,农业以及大致同时驯化的家养动物羊和牛等也更高产,但是陶器的发明与使用则比农业要晚数千年,因此,曾经存在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东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东亚存在华南稻作与华北旱作两个早期农业起

源中心,但是华南地区傍水生存的丰富采集者在距今约2万年前就发明了陶器,并在不晚于西亚麦类驯化的同时开始对稻作农业的探索,并在近海的丰富采集人群中比较迅速而广泛地进行传播,而稻作,早作农业距今9千年左右在南北气候交汇带淮河上游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中已相互接触并实现初步的融合,最终经过仰韶、龙山、二里头等阶段,在中原地区融汇发展出以复合型低产农业为支撑,区别于麦类河谷灌溉高产农业区社会分工相对发达的王朝式国家文明。发源于东北亚的玉文化南传的步伐也相当快,8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小南山的玉文化,到6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已经形成了以玉通灵祭神的丰富的玉文化体系。玉文化南传到长江流域之后,先后出现凌家滩和良渚两个玉文化的高峰,并在保持玉文化基因的同时,创造出适应于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以琮璧等为代表的一套与敬天法祖有关的巫玉和礼玉系统,为华夏文明的大统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的玉文化主要指被《周礼》等文献系统记载和诠释的玉器组合和文化属性。先人对于红山、良渚等的丰富巫玉文化早已淡忘,仅在《越绝书》中有“玉兵时代”等语焉不详的传说,以及黄帝时代琼浆玉台的模糊记忆。随着小南山等重要发现的不断面世,今天考古学已经大致上可以复原玉文化萌生与演进、传播的全过程及其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与实质性意义。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文明形成及其特点,玉文化是一个亮点,甚至有人提出“玉器时代”的中国式概念,用于对应早于青铜时代的文明形成阶段。实际上,也的确是在巫玉阶段,中国的玉文化和复杂社会的文明特质才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在整体性文化结构中有了特色鲜明的独特地位,脱胎于采集文明的玉文化进入农耕文明并走向礼器化,成为礼制性国家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除了礼仪之外,各类玉器也成为当时各色人等的身份标识,饰玉的装饰性特性不仅长期保存,也逐步和人的德性修养等意识形态观念紧密结合。由于地理环境和驯化动植物的特点,从农业社会到国家文明,中国的融合过程相对更艰难也更长,发明了最早的玉文化的东北亚采集人群尽管向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贡献了玉文化基因,但却长期盘桓在华夏边缘,采集人群和更晚兴起的游牧人群不断以文化互动甚至是南下入侵的方式刺激华夏文明开发内部动力,进行升级换代,在由华夏文明走向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中,仍然持续不断地贡献各种文化活力。

总之,玉文化是华夏文明体系中一根独特的线索,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深层精神信仰具有密切关系,也与由多元走向一统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考古发现正在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

展。新考古学又称为“功能-过程考古学”,与我们目前采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同,功能-过程考古学将文化看作是适应和开拓环境的手段。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功能分析就是需要了解某一时期的生活是怎样生活的。这需要在田野工作中重视水平发掘,仔细寻找和完整揭露居住面或活动面,仔细清理和观察工具、房屋、窖穴、神龛或庙宇、作坊、墓地等某史前社群的不同活动地点的特点和分布,将它们看作是社群当时如何生活和组织起来的遗迹,以便了解他们的技术、生业、社会组织乃至宗教信仰。如果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群营地,那么发现和揭露某个遗址的居住面,就可以了解这个社群的规模、技术工具、食物类型以及移动方式。如果是农业社会,那么一个村落水平发掘就能了解村落的家户结构、技术工具、经济形态、人口规模和社会发展层次。基本了解这是一个平等社会还是等级社会。如果将一片区域基本同时期的村落遗址的居住面放在一起观察,那么我们就知道,在某个时段里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我国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发掘,就是这种功能分析的代表性案例。如果采用科技手段分析这两个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生态物以及各种遗迹所反映的遗址域、生产技术、生态环境、资源利用、食谱、营养和病理,那么就能重建仰韶半坡时期的原始社会概貌。

过程分析就是对某个居住时间较长的遗址做仔细的垂直发掘,从上到下水平揭露不同时期的居住面,观察各种遗物遗迹的功能特点,了解不同时期这个遗址先民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通过不同时期居住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遗址社会文化从早到晚的历时发展。从环境变迁或文化特征的改变,我们就能探索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垂直分层越细,文化变迁的过程就越清晰。

我国目前的田野发掘还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为主导的方式,即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一个遗址断代和分期,并确立其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这种分期一般也比较粗糙,一般分三四期或早中晚三期也可以了,要求并不严格。而水平发掘也不在居住面和遗迹遗迹的功能关系,能够记录一些小件和精美物品、灰坑、房址和墓葬的分布。但是,目前的研究基本并不从出土遗存来了解文化的功能或观察社群的适应和活动。

从功能观来分析某遗址层里出土的人工制品、动植物、花粉、人骨等各种遗物和生态物,就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来分析这些出土材料,以便能够详细了解这些材料所反映的生态环境、技术工具、生业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人类寿命、营养条件以及性别分工等状况。这些材料分析的结果,提供的是某个时期先民生活生业的动态图像,而不是过去那种坛坛罐罐、见物不见人的静态描述。

从过程论而言,对于一个延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遗址,如果结合仔细的水平发掘和有控制的垂直发掘,便能连续揭示多个重要时期的居住面,那么我们就从水平/功能与垂直/过程的角度重建这个遗址的历史乃至社会复杂化过程。所以,科技考古只有在为考古材料功能-过程分析中才能真正发挥它重建历史的作用,离开了这个目的,科技手段并无本质的价值。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外考古学的科技手段很快就被我们吸收和借鉴,但是与其相伴的理论思想却受到漠视,大家并不关心这些科技手段原来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被发明和利用的。这是因为技术和方法比较实用,很容易被模仿。但是理论和思想却代表了学派和立场,一般不容易被采纳。于是,我国考古学界在引入科技手段后,田野工作仍然是原来文化-历史学范式。而从事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专家们又出自不同的训练背景,于是科技考古的“毛”就难以依附在田野考古的这张“皮”上,造成了脱节。这也是我国田野工作者和科技考古学者缺乏交流的原因。两群人各开各的会,最多将科技成果作为附录放在考古报告的后面。尽管科技考古看上去成果斐然,但是对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并无实质性贡献。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田野工作者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这就是除了构建遗址的年代学、分期和文化性质之外,还要进一步探索遗址人地关系和考古学文化的功能问题。研究环境、生计、技术工具和社会结构等不同问题需要各种不同的样本,在这种问题意识指导下,田野工作的发掘和采样就有了目的和方向。他们应该告诉科技工作者到哪里采样,采集哪些样本,并需要量化的功能,以便以后在综合分析中进行对比。如果没有过程-过程论的问题意识,科技考古采样成了与田野发掘无关的工作。科技工作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寻找一些样本分析和发表大功告成。这种研

究成果虽然有时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洞见,但是对于了解遗址的历史并无多大的用处。

我们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有许多来自理科专业,未必都受过严格的考古学训练。于是,他们对考古材料的兴趣和问题可能与田野考古学者不同。他们以自身出发的科技分析,一般并不能解决田野考古的问题。要根本解决两者难以契合的困境,田野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必须密切合作,以共同问题来指导采样和材料分析。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田野工作者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年代学问题转向考古学文化功能和过程的问题。没有范式的转向,科技考古的探索仍然是无皮之毛、无肉之尸。

与此同时,科技考古工作者也需要熟悉国际学界考古学范式的转向和田野考古的问题意识,为田野考古的不同问题设计各种采样的方式和提炼的信息。为了观察和比较文化变迁的速率和文化的异同,不同材料都必须采取量化分析,这样才能提高分析的精确度和置信度。

在学科交叉初期,科技手段被看作是辅助性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各个领域进行平行的研究,并各自独立提交报告。但是,真正的学科交叉应该是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一起解决同一个问题。他们同步努力,彼此协调,设计和起草不同的方案,然后起草一份整体的设计方案,追求最大程度的统一。只有当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达到一定的程度,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才算进入了跨学科的层次。

今天,考古学已成为如此广阔的天地,以致考古学各领域都日趋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则总是一个人的工作。尽管这种综述是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必须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并且对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

这种跨学科合作才应该是我国科技考古努力的方向和田野考古学历史重建的最终目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